

『信、達、雅』的另類思索

李文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清儒嚴復曾舉「信、達、雅」為「譯事三難」，今被業界奉為評判譯作的準則。當時是一八九七年，語言學之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還沒開始寫書，語意大師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還是八歲孩童。如今時空全變，發展近百年的西方語言學如日中天，百家爭鳴。嚴復想當然爾的「信、達、雅」三論，在今日的學術環境中是否經得起考驗？本文將從當代西方立場加以分析，說明「信」與「達」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雅」則不是翻譯的必要條件，而「信」所指何物也尚無定論。

先從「雅」談起。文字必須文雅的概念，是科舉時代文人雅士的遊戲規則，適用範圍是詩詞歌賦，而在資訊網路時代的白話文體中未必能派上用場。其理由很簡單：翻譯文雅與否，需視原文的題材和屬性而定：學術論文或外交辭令固然需要典雅莊重，但把饒舌歌詞或聊天室對話翻得文謏謏則顯得格格不入。因此「雅」作為評判標準，只適用於某些特定種類的譯文，而不能當作一般翻譯的普遍原則。

再說「信」。所謂「信」，也就是「忠於原文」。什麼叫做「忠於原文」呢？有一種說法是，讓讀譯文的讀者能夠得到和讀原文的讀者同樣的感受，這就是「保留原味」，這就是好的翻譯。這種定義看似合理，但其實暗藏玄機。問題之一在於「原文讀者」有很多種：

以莎士比亞翻譯為例，對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戲迷而言，莎士比亞的文字是白話的口語，但對二十世紀的美國人而言，莎翁的台詞是半文言的古文。我們這時所要模擬的效果，是十七世紀觀眾的體驗，還是二十世紀讀者的感受？如果是前者，則必須把莎劇翻成最白的白話；如果是後者，則需要翻成類似紅樓夢等古典小說裡的語言。究竟哪一種比較「忠實」？恐怕見仁見智。看來似乎「忠實」並沒有單一標準，而是一個極富彈性的多元概念。

再看前幾年討論得如火如荼的金庸小說翻譯。金庸小說中的武俠成分該如何用英文表達？關於這個問題，有兩種主要看法。一種看法是把武俠當作中國文化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中國味」不可喪失，譯成外文之後也仍須保留人物、武器、招術的中文名稱，以營造古代中國的氣息。早期的各種中國古文名著翻譯，多半是以這種方式成書的。這種作法看似合理，但其實已經違反了我們先前對「忠於原文」的定義。我們先前說的是要讓「讀譯文的讀者能夠得到和讀原文的讀者同樣的感受」：中國人讀中國武俠小說並不會覺得讀起來像外國作品；可是我們卻要英、美人士讀起來覺得它是有異國風味的中國作品，多增添了一層隔閡，在譯著中擅加

了原文所沒有的成分。

也有人試著把中國武俠小說翻成讓西方人讀起來沒有東方味的作品。香港理工大學教授閔福德（John Minford）在翻譯金庸的《鹿鼎記》和《射雕英雄傳》時，即試圖以歐洲亞瑟王傳奇、中世紀宮廷羅曼史，及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三劍客》等作品中的語氣和詞彙代替中國武俠用語。閔教授把翻譯看成是一種比較修辭學，認為譯者的工作是幫助原作者在另一語言中複製原著在原文讀者心中所激發的想像。但縱使能從歐洲騎士傳說和劍客文學中找到中國武俠的對等詞，其結果也未必是理想的翻譯，原因在於騎士和劍客並不生活在同一時代。一般人並不會把兩個語意場的詞彙混用。英譯《鹿鼎記》曾被六十多家出版商退稿，原因之一，是用詞給人時空錯亂、語氣不一致的困擾。試想，如果同一語句中參雜著《論語》、《孟子》的文言文、徐志摩的民初散文、水滸傳的俠義用語、和 BBS 上的台灣國語，讀起來是什麼感受？再擴大範圍，如果整篇小說全都是這種拼湊而成的句子，可讀性有多高？

由此可見，要定義「信」，首先必須決定是要取信於作者還是取信於讀者。取信於作者會使讀者讀起來多一層時空隔閡，而取信於讀者則需作文化轉換，使「信」更接近於「達」的概念。文化與文化之間雖然不難找到相對應的零星概念，但個別概念合併後卻未必能保存原著的連貫性。可見「達」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達到的。

由以上討論可以看出，信、達、雅三成份，或無法定義，或彼此衝突，或不適用於所描述的對象。本分析凸顯了古代儒學和現代語言學在治學態度上的差別：在古代中國，只要有威望的名士憑印象作趨勢觀察，不需經過科學檢驗，即可被後世奉為至理名言。在當代則不然——若要發表論文說明翻譯的準則有三，則必須證明三條件互不重疊，在邏輯上是三個獨立的空間度，而且三者的聯集是專業人士評鑑翻譯作品時的全部思考過程，是好作品的充分必要條件。時代在變，知識在進步；當人們有了儀表、雷達、衛星可以測量距離時，何必還要憑步行來測量遠近？現在該是以嚴謹的語料分析代替信、達、雅含糊概念的時候了。